

## 伊拉克战争后的 中美关系<sup>\*</sup>

● 倪世雄 庄建中

始于2003年3月20日的伊拉克战争是“9·11”事件后美国主打的第二场战争，是当前国际上的重大事件。这场战争的本身，以及其前在联合国的辩论和其后美在中东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对整个国际社会，对大国关系有深刻影响。自然，它对中美关系也有多方面的影响。本文探讨的是：1. 伊拉克战争本身对中美关系的直接和间接影响；2. 探讨在伊拉克战争前后这一段时间内影响中美关系的各种因素的方方面面；3. 对处理好今后的中美关系几个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

\* 本文系教育部文科科研点基地重大项目“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的研究成果之一。

## 伊拉克战争在几个问题上 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 一、伊拉克战争对中美关系总体 上没有多大影响

1. 中国认为伊拉克战争是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战争，是一场借反恐防扩为名进行而实际证据不足的战争。所以，中国明确反对这场战争。这样，伊拉克战争对中美关系就是一个负数，一次考验。但是，由于中国采取“不挑头”，“不扛旗”，“不背包袱”的政策，保持了低姿态，所以，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中美之间没有迎头相撞，发生正面冲突。这样，就避免了中美关系的一次大的起伏。

2. 但是在伊拉克问题上，中美之间并非完全都是分歧。对原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是否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国主张要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安理会授权的组织彻底查清。在要求萨达姆政权遵守安理会的一系列决议这一点上，中美之间是一致的。而且，就是在中国担任 2002 年 11 月安理会主席的这个月里，由于中国的积极作用，安理会 15 个成员国一致通过了历史性的第 1441 号决议。

3. 第 1441 号决议通过后，美国执意动武，推翻萨达姆政权，在单边主义的驱动下决定实施“先发制人”战略。于是美国就绕开了联合国，成立了“自愿联盟”，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这样，中美之间才发生了明显分歧。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主持正义、公道，积极斡旋，中国领导人与美国和其他安理会成员国领导人多次通电话，争取和平解决。中国既没有组织国际上的反霸联盟，也没有在国内组织反美示威，而是以联合国的决议为原则，以和为贵，以中美关系的大局为重。这几个月事实证明，中国的立场是正确的，外交上的处理手段是成熟的。

4.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中国坚持应发挥联合国在伊拉克重建中的重要作用。中国表示积极参加人道主义救援和重建伊拉克。尤其是，中国对于解决巴以争端，争取中东和平路线图都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中国的这些立场无疑是对中美关系是有益的。

## 二、伊拉克战争后，中美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合作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1. 伊拉克战争后，朝鲜核问题凸显出来。虽然美国布什政府当前的外交重点仍在伊拉克，在中东，但是亚洲的安全，特别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不能不引起美国政府的特别关注。

2. 中美之间在朝鲜核问题上有共同利益。朝鲜半岛的

无核化有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对中美关系是个正数。基于这一共同点，中美之间在朝鲜问题上展开了合作。尤其是中国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建设性作用。3月中旬中国派特使去北朝鲜，4月23-25日在北京举行了美中朝三方会谈。7月，中国又派特使去俄罗斯、朝鲜和美国，为促成新一轮会谈奔波。中国的努力得到美方的赞扬，也为中美关系发展创造了条件。世人都会注意到，中美之间在亚洲地区安全问题上是可以开展合作的。

3. 但是，在朝鲜核问题上中美之间也不完全一致。中国强调和平解决，而美国则既表示要和平解决，又要施压，采取强制措施，甚至不排除武力手段，搞政权更迭。就是在和平谈判上，中美双方主张也不完全一致，中国主张不拘形式，可以是多边框架下双边会谈，而美国强调多边，不愿双边直接对话。

随着朝鲜核问题的解决取得进展，中美之间既存在着有利于中美关系发展的巨大的战略合作的机遇，也存在着由于分歧而产生新的矛盾的可能，这是对伊拉克战争后中美关系的新考验。所以，这里同样需要双方顾全大局，互相协调，需要外交技巧。

### 三、伊拉克战争对海峡两岸关系 无直接影响

1. 虽然陈水扁为了讨好美国采取了积极支持伊拉克战争的态度，而中国大陆则相反。然而，由于伊拉克战争距离

遥远且速战速决，再者，中美双方都没有把台湾问题与伊拉克战争挂钩，所以看不出这场战争本身对台海局势有重大、直接影响。相反，在伊拉克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日子，两岸一贯争论的问题竟有 20 多天未见诸台湾报纸。难怪有学者认为伊拉克战争降低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还有学者说，台湾问题被伊拉克战争“边缘化”了。

客观地说，在伊拉克战争前后这段时间里，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上依然有所发展。既有向好的方向进步，也有向坏的方向退步；既达成了一些新的共识，又出现了一些新矛盾。

2. 伊拉克战争结束不久，6月1日，胡锦涛主席与布什总统在法国的埃维昂见面。会见中，在台湾问题上胡主席明确表达了中方的立场，要求美方履行承诺，切实执行一个中国政策。胡主席介绍了我国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强调现在的问题是台湾当局拒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这是台湾海峡局势紧张、两岸关系不能改善的根本原因。布什重申美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反对台湾独立。外界注意到，布什的表态把这三点并列在一起，被人们称作美对台政策的“三根支柱”。虽然这三条过去也出现过，但连续这样说，不能不对台海局势产生新的微妙影响。尤其是布什又明确重申“反对台独”，这不能不说是“台独”分子一个新的警告。

在台湾问题上，另一件重要事情是在6月中下旬。美国方面对陈水扁要搞公投表示了“关切”，并要陈水扁“自行承担后果”。美国政府的这一预防外交，主要是出于对台海局势稳定的担心，害怕出意外，局势失控。虽然美国没有明

确反对一切公投，但美国的立场对意在搞渐进式台独的陈水扁来说，绝对不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3. 近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也有错误的信号。这就是美台军事、政治关系继续升级。台湾的“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6月在五角大楼会见了美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其后，台湾的“外交部长”简又新在美国参加企业研究所学术会议时私下会见了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7月初，“美国在台协会”首次在台北举行大规模“国庆”招待会。这一切都说明，在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政府里有一些人自我感觉太好，他们有恃无恐，我行我素，把政府间的正式协议不太当回事，视自己的保证为儿戏，这对中美关系无疑会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 **四、伊拉克战争后，美国重新调整 全球军事部署，加强在亚太地 区的军事存在，将对中美关系 产生长远影响**

1. 由于发生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新军事变革以及在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军的军队转型，由于“9·11”事件后美国安全威胁的变化，美国的新军事战略正在形成，美军的军事部署正在调整，其战略重心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伊拉克战争大体结束后，这种部署的变化立即加速进行。在亚太地区，美军军事部署调整的构想是：调整朝鲜半岛的美军部署，调整驻日美军，加强以关岛为中心的 second island chain 基地建设和

驻军，加强在新加坡、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存在。

2. 美军在全球军事部署的调整，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军事部署的调整对中美关系将产生长远的复杂影响。一方面，美军军事部署的调整可以更好地对付恐怖主义，应对东北亚地区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局势。但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加强日本军事力量；强化美韩军事同盟，加强韩军军事能力；强化美澳军事同盟，加强美澳日为核心的安全磋商，对亚太安全并非福音。

尤其是在这次亚太军事部署的调整中包含着对付中国的因素，有针对台海地区出现紧张局势，准备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抗为背景的调整。这肯定使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更加复杂，使台海的稳定和平潜藏着危机，使未来中美两军的安全方面冲突的变数增加，对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

## 驾驭规律，把握全局，求同存异

综观伊拉克战争前后这几个月的中美关系，无论是本身对中美关系的冲击，还是在一段时间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朝鲜核问题、台湾问题、非典问题等等，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可以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高度去分析研究，对当前的中美关系做一些判断，对未来的中美关系做一些预测。

## 一、我们可以对当前的中美关系 做一个总体上的判断，即中 美关系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 “相对稳定的时期”

首先是“相对稳定”，就是比较平稳，双边关系有了实质性的改善，而且总体上保持了继续向前发展的势头和仍有改善的空间。对此，更有人称为“自天安门事件以来的最好时期”或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我们倾向于用一个“相对稳定”作为比较客观、不过分乐观的描述。其次，这是一个“时期”，不是一阵子，而是有一个“时间段”，少说可以有几年，如果搞得好，也可以延长至一、二十年。

做这样的评判，当然是根据这一时期国际上的政治多极化趋势、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以及在这一段时期内，两国国家利益和内外政策的战略取向而做出的。这正是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在埃维昂会晤时所分别强调的。据何亚非司长回忆：“胡主席从战略的高度讲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指出中美是两个大国，在世界上具有重要的影响。两国在各个领域，特别是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反恐、环保、防治疾病等诸多领域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布什也明确表示非常希望发展良好的中美关系。他说，与中国保持密切的关系，对

美国来说很重要。目前两国之间没有不必要的紧张。”<sup>①</sup>也就是说，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两国的共同需要。

当然，我们说的稳定是相对稳定，不是绝对稳定。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伊拉克战争前后也有许多事件在冲击着这个稳定，考验中美关系。但是，经过小幅摇摆和震荡，又会恢复动态的平衡，回到中线，回到正常轨道上来，恢复相对稳定。这就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内在规律，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所致。

## 二、我们可以对当前中美关系特点做出的另一个判断是中美两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和而不同的年代”

中美关系的定位是“建设性合作关系”，这几个字中建设性是限定词，合作是主要的，合作应该是主题、主流、主旋律。江泽民主席在去年10月访美时用了一句中国的古语：“和而不同”，可以形象地表述中美关系的特点。中美之间确实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如全球的战略利益，地区的安全利益，双边的经济利益。中美双方都认识到这些利益是基础，是十分重要的，是高于一切的。而同时中美之间也总是在人

---

<sup>①</sup> 《世界知识》2003年第13期，第20页。

权、台湾等许多方面有着深刻的分歧。作为政治家、外交家就要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善于求同存异，善于扩大共同点，强调共同利益，增加共识，增进合作；同时又要善于缩小分歧，善于妥协，善于化解分歧，减少分歧点。现在中美两国不仅领导人，而且许多普通老百姓都意识到，中美两国合作双赢，对抗俱伤。要多合作，少对抗；多对话，少对骂；多交友，少树敌。尤其不可轻言中美之间必有一仗。君子动口不动手，有了分歧可以谈判，把问题讲清楚，而不要把话讲绝，把路堵死。大家都尊重对方的根本利益，对方的底线，不要动辄制裁。对于反制行动，也要有所克制，凡事有个度，反应要不过分，要使关系处于“和而不同”，“斗而不破”的状态。无论是伊拉克战争还是台湾问题，看来我们都是这样处理的。这里面有高度的原则性，也要有高度的外交技巧和灵活性。正如江泽民主席所说，“中国哲学一向崇尚共存、共享、共赢，海纳百川，有容乃大”。<sup>①</sup>

### 三、我们还可以对中美关系的未来 做一个总体的估计，只要我们 登高望远，着眼全局，我们可 以化敌为友，共创未来

毛泽东主席说过，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看问题不能

---

① 《人民日报》2003年7月21日。

光从一方面看，要从多方面看。

美国这次确实是不顾席卷全球的反战浪潮，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绕开联合国打了一场国内外很有争议的伊拉克战争。但是，我们不能把美国整个对外政策及伊拉克战争后的战略取向都概括为：外交上的单边主义，军事上的先发制人，政治上的输出民主。然后，不断地预测美国的下一个目标，一会儿是叙利亚，一会儿是伊朗，一会儿是北朝鲜，最后是中国。这样，中国肯定是美国的敌人。也许，美国有一些人是这样考虑的。但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先发制人这一说，是用来对付恐怖主义的，并不是今后什么事情都要先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在外交上，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特别提到：“9·11”事件之后是大国合作共同反恐的巨大的战略机遇。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加强，但整个美国的对外政策还是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的结合。至于输出民主，这是美国人权外交的一贯所为。伊拉克战争是美国用改变政权的方式输出民主，美国不会也不可能对每一个它不喜欢的国家都用战争来改变政权。

关于美国的下一个目标。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的下一个目标不是叙利亚，也不是伊朗，而是重建伊拉克，推动和平进程。现在美国在伊拉克的处境很难，那儿的情况一团糟。中东的和平路线图要实现，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所以，美国的下一个目标不可能是叙利亚、伊朗，现在也不可能是朝鲜，更不可能是中国。虽然伊拉克战争是新保守主义主张的一种体现，但是他们的主张不会完全主导美国政府的政策。他们中的确有人想把先发制人的主张普遍化，但共和党的其他派别会起平衡作用。新保守主义当前在美国很得势，但不

可能过分膨胀，走得太远。新保守主义主张要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但这不一定行得通。对于所谓美国的“帝国论”，鲍威尔的回答是：“美国不需要也不想当‘帝国’。”<sup>①</sup>美国的战略目标更确切地说是建立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不让任何其他大国向其挑战。反恐防扩则是其当前的首要任务。这是美国许多官方文件和要员都承认的事实。这样看，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后不会把中国当作敌人。所以现在在美国“中国威胁论”的市场小了。虽然，仍有人坚持认为中国将来可能是美国的敌人，但更多的人觉得，这是可以避免的，如布什总统所说：“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只有相互不把对方看作敌人，才能真正发展长期稳定的中美关系。”美国驻沪一位外交官的这段话是十分正确的，而且涵义深刻。另一位美国学者马丁·谢尔夫指出：“现在美国有一些学者常常把中国主张多极化，国际政治民主化，与俄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看作把美国作为敌人。因此，在华盛顿，有相当一些有影响的战略家、智库外交政策分析人员和特殊利益集团的人就认为中国是美国必须在今后 50 年里遏制的超级大国对手。如同在 20 世纪的上半期对付德国，在下半期的冷战中对付苏联那样。”<sup>②</sup>作者认为：“这样的观点太简单化，因循守旧，建立在对其他国家复杂生活的无知上。”伊拉克战争的现实告诉我们，中国并不反美，中国也无意与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结盟反美。我们只是作为安理会

---

① 2003 年 7 月 19 日接受蒙特卡洛广播电台时的讲话。

② 尼克松中心：《国家利益》，2003 年 7 月，第 2 卷 28 期。

的常任理事国尽我们的义务，在国际生活中主持公道，主持正义，反对强权政治和霸道作风。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历史也会作出公正的判断。

## **抓住机遇，务实求真， 切实推进中美关系**

为了建立一个面向 21 世纪、长期、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我们既要有战略眼光、全局观念，又要有具体措施，切切实实地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 **一、抓住战略机遇期，着眼当前间隙期**

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当然是建立在对世界格局、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政治各种因素的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是：我们必须而且能够保持与美国的长期、稳定的关系。因为，如果我们在这段时间里与美国对抗一场，我们是不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所以，对美国“发展合作，共创未来”是战略机遇期的重要保障和根本任务，是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的，不是什么亲美反美的问题。我们要抓住战略机

遇期，就要做好对美工作，搞好与美国的关系。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发现在伊拉克战争后，在美国大选前后也存在一段战术间隙期。这一段时间里，美国的外交重点仍在伊拉克，在中东地区。因为如果驻伊拉克美军死伤不断，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战争前功尽弃，若是中东和平路线图没有进展，布什便会脸上无光。布什这一段时间里也想在朝鲜核问题上有所突破，但是除了和平谈判外，不可能再“先发制人”，布什政府现在没有力量再发动一场战争。因为这场战争将消耗许多财力，死亡不是几百人，而是成千上万。美国现在经济不好，布什在这段时间里的国内工作重点是振兴经济，搞好经济，争取连任是其优先考虑。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为这一段时间是中美关系可以搞好的最佳时期。中国可以在美国领导人眼里变得“更伟大”，中美在朝鲜核问题的合作可以变得“更重要”，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可以“更明确”，中美关系可以“稳定，更稳定，长期稳定”。

## 二、从克劳福德到埃维昂，承上启下， 建立新的中美关系框架

2002年10月，在克劳福德江泽民主席与布什总统的会晤是在中共“十六大”权力交接的前夕，而2003年6月在埃维昂的胡锦涛主席与布什总统会晤是在胡主席执政近百日，中国抗“非典”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关键时刻。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元首在埃维昂的会晤

就显得特别有意义。因为这次会晤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定下积极基调的作用。如果说2002年10月的江泽民主席与布什总统的克劳福德会晤为稳定中美关系奠定了基础，那么2003年6月的埃维昂会晤为进一步发展和改善中美关系提供了机遇。特别是朝核问题的新发展，更加迫切需要两国领导人争取新的合作。

美中双方对于中国第四代领导人接班后的新的中美关系都寄予希望。美国希望建立：“强劲的美中关系”，新世纪的美中关系，尤其要与新一代领导人的个人关系，更多地会见、接触、了解中国新一代领导人。

新人会有新面孔。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这半年中的表现，特别是在抗击“非典”战斗中的魄力，果断务实的风格也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有不少学者赞扬了新一代领导人，称他们是“难得的新领袖”。虽然，中国的外交具有连续性，而且大政方针已在“十六大”确立。但是“与时俱进”的新的中国领导人，在处理新问题中，会体现新的求真务实风格、更加开放、走向世界的姿态、敢于做负责任大国的决心和积极主动解决问题的精神。我们相信今后的对外政策会有新的变化。

### 三、求真务实，处理好五个问题， 推进中美关系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任何时候总是如此。现在，我们既要看到中美关系有相对稳定的一面，也要看到有相对脆弱的

一面；既要看到合作的一面，也要看到分歧的一面；既要看到当前平静的一面，也要看到有风浪，一有突发事件，就会发生危机的一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要时时刻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未雨绸缪，搞好应急机制。在处理中美关系的过程中，根据过去的经验和当前的现实，我们觉得要处理好五个问题，这样才能务实地、具体地解决实质问题，保持中美关系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

### （一）反恐与反霸

反恐防扩是美国当前最大的安全关注，也是全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任务。中国作为一个安理会成员国，理应负起责任，积极支持配合。因为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和平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本来就是中美关系的基础之一。

美国在反恐过程中，单边主义明显，强权政治突出，霸权明显上升，这也是一个客观现实。中国主张凡事要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与合作来解决有关问题；中国主张通过联合国，依据国际法，多发挥其他大国的作用；中国主张国际新秩序，推进多极化，反对霸权主义行径。但是，中国并不主张冷战时的两极对立，也无意与其他大国组成反霸统一战线。中国现在韬光养晦，并不是为了将来成为超级大国与美国对抗。这一点美国人也要理解。否则，中美关系就搞不好。我们要珍视当前的合作，把战略分歧控制在可管理的范围内，要实事求是，凡事不要无限上纲，泛政治化。

## （二）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

布什政府是带着新现实主义的观念执政的。其对外政策中充分体现了以实力为基础、靠实力解决问题的观念。特别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变了，美国对其安全威胁的认识变了，美国的许多对外政策也变了。其新现实主义的观念，从防御性现实主义，转为进攻性现实主义。

布什政府对于威胁来自何方的变化当然有有利于中美关系发展的一方面，但是其进攻性现实主义会导致“先入为主”、“先发制人”，容易迫不及待，神经质地把什么都当作“冒烟的枪”。这样就会驱动其对外政策走向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具有冒险性的一面，也会造成中美关系不断分歧和潜在的危机。这必须引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注意。中国支持美国打了阿富汗战争，而反对伊拉克战争，就是因为这里有“防御性”和“进攻性”的区别。我们对美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要有理性的客观分析，不要简单化、机械化、情绪化，一律反对或一贯支持。这样才有利于中美关系。

## （三）低位政治和高位政治

中美之间的合作正在从低位政治走向高位政治，全面的全方位合作。所谓“低位政治”就是指经济、环保、疾病等非传统领域的合作，而“高位政治”则是指军事、安全、防扩散等传统领域的合作。

当前，无论在传统安全领域，还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都

存在着对和平和发展的威胁。我们中美两国要好好加强这两方面的合作，不要偏废哪一方面。当然，两国在这些领域里有许多不同的观念和政策。但是，我们应着眼于合作，着眼于共同点。从各自的实际利益出发，在中美关系中寻求两国利益的汇合点，强调合作，但也不回避矛盾，对分歧坦诚相对。事实证明，无论是低政治领域还是高政治领域，都是有发展合作的余地和空间的。

#### **(四) 硬实力和软实力**

一个国家的实力，是建立在硬实力和软实力基础上的。美国对外的影响，既有军事手段，也有自由、民主的理念和价值观。中美两国的交流既有经济、军事，也有社会交往和相互的文化渗透。我们要警惕美国利用软实力来影响我们，改变我们的信仰和制度，但是我们不能太意识形态化，不要把文化交流、政治观念的碰撞都看成是“软刀子杀人”、“和平演变”。东西方的文化有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地方。对中国来说，学习人类先进的文明，学习法治、管理和优秀的西方文化中的精髓，是符合“三个代表”中的代表人类最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

对美国来说，也不要夜郎自大，对其他文化嗤之以鼻。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文明历来为世界各国所称赞。

#### **(五)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NGO)**

几十年的中美交往史表明，政府间的交往，尤其是两国

高层领导人的相互交往是非常重要的，而历来中美元首间的会晤对推动中美关系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两国间各个职能部门的交流和合作，联手处理共同问题，可以使中美关系更具体化和实质化。这是扎扎实实发展中美关系的日常工作，是中美关系的主要构成部分。现在中美经济关系发展迅速，今年头 5 个月，中美双边贸易额达到 464.2 亿美元，同比增加 35.4%。文化交流也很频繁，军事交流有所加强。

近年来，非政府组织在加强中美交往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十年前，世界上的非政府组织才 16000 多个。如今，已达 60 多万个。在中国，NGO 也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这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今后，非政府组织在全球事务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像这次反伊拉克战争，组织全球大游行一样。同样，加强中美两国间 NGO 的交流，有着政府间交流不可替代的作用。

社会联系主要是人民间的交流：即民间的经贸、旅游和留学是社会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的草根。今年是中美文化教育交流恢复 25 周年，这些年来中美两国间的文化、教育和旅游事业大大发展，现在每年有几十万人次的来往，中国有几万学生在美国学习，这对于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增加两国间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总之，我们如果能够处理好以上五个问题，中美关系就能够在 21 世纪达到一个新水平。

## 作者简介

(以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王义桅  |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 任 晓* |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
| 刘永涛  |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 庄建中  | 上海环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
| 孙 哲  |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 纪志斌  |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
| 吴心伯  |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 吴苑思  |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 张纪康* |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    |
| 夏立平* |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
| 倪世雄  |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 徐以骅  |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 郭学堂  | 同济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     |
| 唐小松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